

01 巴巴拉·W·塔奇曼作品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巴巴拉·W·塔奇曼著 万里新译

史迪威与美国  
在中国的经验  
1911 - 1945

*Barbara W. Tuchman*



中信出版集团 CHINA CITIC PRESS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巴巴拉·W·塔奇曼作品

01

[美] 巴巴拉·W·塔奇曼 - 著

万里新 - 译

# 史迪威与美国 在中国的经验 1911 — 1945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11—1945 / (美) 塔奇曼著; 万里新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10

书名原文: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ISBN 978-7-5086-4817-0

I. ①史… II. ①塔… ②万… III. ①史迪威, J.W. (1883 ~ 1946) —生平事迹②对华政策—美国—1911 ~ 1945 ③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1911 ~ 1945 IV. ① K837.125.2 ② 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8732 号

STI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by BARBARA W. TUCHMAN

copyright: © 1970, 1971 by BARBARA W. TUCH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USSELL & VOLKENING,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11—1945

著 者: [美] 巴巴拉·W·塔奇曼

译 者: 万里新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 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2.5 字 数: 606千字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817-0/K·413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序<sup>①</sup>

费正清

巴巴拉·W·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是一部杰作，这是出于许多很不相同的理由，每一条理由都足以让它流传下去。首先，它富于戏剧性。这是一部生动的传记，讲的是一位古怪但却真实的英雄，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当美国陆军 1940 年在路易斯安那举行军事演习以物色有才干的指挥官时，乔·史迪威（Joe Stilwell）<sup>②</sup> 表现得极为敏锐、富有想象力而又不墨守成规，当时他就已经是闪电战的高手。在陆军的九个军级指挥官中他得到了最高评价，并受命率军进攻北非。他本可以成为像欧洲战区的布莱德雷或者巴顿那样的人物。可是，由于他的中国经历，他被派去处理那里的危机。

不过，美国在中国的战时努力基本上是白费了——即便我们承认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战争本身不过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对人的耗费而已。史迪威将军恪尽职守，这使他能屡屡创造奇迹。他这次冒险本来就凶多吉少，当时在蒋介石委员长统治下的“自由中国”已经濒于崩溃，而史迪威名义上是蒋介石的“总参谋长”。这是多么鲜明

① 本序写作于 1985 年。——编者注

② 全名 Joseph Warren Stilwell, Joe 为 Joseph 的简称。——编者注

的对比！一个是美国的顽强的理想主义者，决心训练出理想的中国军队并“打垮小日本”；另一个则是狡诈的军事政治家，同样很有决心，那就是不想让中国继续打下去，从而保住自己的位子。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对峙浓缩了美国在中国的战时目标所遭遇的种种挫折。

然而本书并非只是快节奏地叙述笼罩在悲剧阴影下的纷繁事件。隐藏在这个关于战争的故事后面的是长期以来美国试图使中国跟自己更相似的努力——这是个堂吉珂德式的努力，但是屡败屡试，现在这种努力又再度兴起了。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结语恰如其分（直到1971年前都是如此）：“最后，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就仿佛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似的。”但在将近十五年后，另一轮的接触、旅游、交流、投资和外交活动又在开展了。现在是美国公众好好回顾从前的的时候了，用中国人的话说即所谓“前车之鉴”。特别是当我们发现，帮助盟友国民党使我们成了共产党所发动的中国革命的敌人，对我们来说最糟的是，这场革命最后成功了。

总之，正如我们说过的，我们开始是想帮助中国，而之后在冷战的强权政治中，出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又跟中国人对立起来。这样做真的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尤其在考虑到那就是我们的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序曲时？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直至今天仍然很重要的问题。

但这本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是部一流的历史著作，作者是一位自信而又熟悉这种艺术的大家。一开始巴巴拉·沃特海姆·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就很自然地跻身于美国知识精英阶层中。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纽约从事实务的人中的自由派领袖。她的外祖父是老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老亨利的儿子，也就是她的舅舅，后来成了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她还是哈佛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的学生时，就曾陪祖父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对她来说，眼界高远和公众人物的品性都是遗传的一部分。

在拉德克利夫的时候，她专注于既相关又各有专攻的历史和文学。1933年她毕业后不久，这个世界就不得不为反对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而动员起来。她积极主动、思路清晰而又无所畏惧，这些素质使得她成为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研究人员。1934年她在纽约，1935年则在东京。该研究所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智囊团”和会议组织，20世纪20年代由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前干事在檀香山创办。它由十几个国家级研究所组成，分布于主要的环太平洋国家，还包括欧洲在那里的殖民地。它独自在太平洋地区开创了当代研究和定期国际讨论的模式，而现在的中心和协会几乎每天都在采用这种研究模式。1935年巴巴拉·沃特海姆从军国主义的东京去了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中国。

回到纽约后她开始为《国家》（*The Nation*）杂志工作，她父亲曾经是该杂志的受托人。然后她在1937年至1938年间去马德里报道西班牙内战。她作为伦敦《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驻美国记者回到纽约，并于1940年与莱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博士结婚，之后生下三个女儿。1943—1945年，她在纽约战时新闻处远东新闻部工作。

对一个家道殷实又忙忙碌碌的母亲来说，这样的早期职业经历足以让她参加外国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从而为纽约的当权者们增光，但也就仅此而已。然而对巴巴拉·塔奇曼来说，她才刚刚走上轨道。1956年，她重拾早年的兴趣，出版了《圣经与剑：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时期的英国和巴勒斯坦》（*Bible and Sword: Britain and Palestin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Balfour*），一本从古代一直讲到1918年的历史著作。那以后她避免了那些牵扯她个人情感的题目，并作为面向大众写作历史的作家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某个把巴巴拉的这些书称为“通俗历史”的批评家与其说是在评论这些书，倒不如说是在评论他自己。确实，它们是“非学术性的”，因为它们主要不是为了讨论那些历史“问题”——太多这类问题来源于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渗透。在大学里，那些寻求科学一致性的人人

侵历史学后强调的是概括、事件的模式和比较研究的先验图式。这些很可能加速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的减弱。总而言之，巴巴拉·塔奇曼主张把历史看作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她可以畅所欲言、深刻，并有广泛的说服力。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相比这些，像社会流动性、合法性、投资比率和工作观念之类的问题则是次要的。她反复强调了事件、人物以及地域的独特性。

当然，多年来在历史学领域里个别性和普遍性一直在争斗，各方都期望获得更多的关注。这里我们很难用只言片语——不管我们怎样斟酌词句——来解决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其实这也用不着我们解决：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是自立的，根本用不着任何理论支持。它就是让读者着迷了，它让他们得以如此接近过去的历史，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她的秘密首先在于她惊人的勤奋。她在研究时发掘了所有的记录，哪怕是最小的纸片也不放过。酝酿《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花了四年，这个时间跟《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花的时间一样多；后者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月，是本畅销书，并获得普利策奖。1967年，当她开始创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的时候，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深入研究已经揭示了“二战”时美国对华政策在外交和官僚政治上的盘根错节之处。两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历史学家写了三厚本有关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著作。事件的框架已经有了。尤为可贵的是，史迪威将军的家人公开了他内容广泛的日记和私人记录。

要关注史迪威，塔奇曼夫人就得避开那些雷区，即那些自美国宣告“失去中国”之后所积累的单方面证据、指责，以及那些各怀心思的回忆录。另外，聚焦史迪威使得她可以探求美国与其盟友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才是关键所在。这样就避免了把注意力分散到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那场殊死搏斗。1946年史迪威突然死于癌症后，国共之间的搏斗挣脱了美

国的影响爆发了，美国国内政坛因此充满了抱怨。

另一个也跟勤奋有关的秘密则很容易被察觉到，那就是巴巴拉·塔奇曼通过掌握并运用这些记录而提炼出了她所谓的“确证的细节”。即便她已经感知了某些事件的相关性，她仍然必须通过现场证据——不言自明的一条引语、一个事实或者另一个事件——才可以将这一点传达给读者。这些细节使得不同事件联系起来。因为她是在讲一个故事，并不是想证明什么，所以巴巴拉·塔奇曼瞧不起计算机打印出来的那些玩意儿，也不喜欢引用其他历史学家的话。“我从来不觉引用某人在旁边大学工作的邻居的话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来源；我想知道某个事实的原出处，而不是最近谁引用了它。”<sup>①</sup> 幸运的是，她除了有一种咄咄逼人的独立精神（虽然她不是位教授），对众多学者所关注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制度或“因素”也具有敏锐观察力。例如，她对蒋介石在中国所达成的脆弱又耗神费力的权力平衡的分析，便是本书阐发的最为清晰的地方之一。她回顾的史迪威的早期经历——他的语言天分和海外游历，他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以及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对中国的探索——既是他本人的传记，又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塔奇曼夫人善于发掘和运用各种记录，这使得她可以把故事贯穿起来。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视角来看，史迪威以及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是怎样的？

历史地看，1911—1945 年是中国摸索建立新政体的时期。直到 1928 年国民党一党专政终于取代了君主专制。不过，自 1931 年起，由于日本入侵，中国的政治生活重又陷入混乱。

<sup>①</sup> 这句话引自《历史泛滥》一文（“History by the Ounce”），载于《哈泼斯》（*Harper's Magazine*），1965 年 7 月，第 74 页。



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和虚弱使得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难得地有了参与中国生活的机会。在很多中国爱国人士看来，美国那些用条约维持的各种特权不过是19世纪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延续。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竟然提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全部中国对日作战部队，这无疑是整个帝国主义历史中一个登峰造极的时刻。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然而……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体是独立自主的，但它的经济看起来仍然需要外国的贸易、技术和投资。自1949年后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这消耗了革命成果。中国的贫穷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人，包括那些阔绰的美国游客，又一次成了贫穷中国的特殊人群。我们再次跟处于统治地位的中国人密切交往起来，跟他们谈生意、交朋友。

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所看到的中国改革是史迪威未能看到的——这是个社会和工业革命的富于活力的交替变化，是乡村和城市人民渴望的此消彼长。仿佛有一个内置的钟摆，引导中国就像一个盲人一样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先在农民中间开展平均主义的社会改革，然后转而在现代技术领域培养出新的统治阶层。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所展现的可不是一种单调的稳定。

自巴巴拉·塔奇曼完成此书后，其他历史学家又有什么新见解？有关赢得了未来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新见解有很多，但有关20世纪40年代美国战时努力的却很少。也许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sup>①</sup>，此书利用了根据《自由信息法案》刚刚解禁的秘密政府档案。沙勒的研究仅仅加深了美国对战时中国的意图和所作所为的幻灭感，而塔奇曼在她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里早已明确传达了

① 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

这种幻灭感。

举例来说，她记载了统率美国驻华海军的米尔顿·迈尔斯（Milton Miles）中校的工作。迈尔斯走在了美国陆军的前面。通过1943年4月罗斯福总统所签署的一个秘密协议，迈尔斯让美国海军利用中国自己的飞机向中国运输军火，并帮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目戴笠对其人员进行培训，从而更好地打击蒋介石的对手——中国共产党。迈尔斯好像有童子军的素质，看上去也很像。他还在海军军官学校（U. S. Naval Academy）的时候，朋友们就叫他“玛丽”，因为他也有酒窝，长得挺像舞台明星玛丽·迈尔斯·敏特（Mary Miles Minter）。在“自由中国”，迈尔斯统率着2500—3000名美国人。有些帮助戴笠进行反共活动，从事暗杀、投毒、抓捕和镇压工作。由于有美国海军上层的支持，迈尔斯屡次挫败了史迪威试图控制他的努力。迈尔斯感到戴笠有种“磁石般的吸引力”，因为他“本身是个自由、民主人士……建立的集中营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他爱自己的母亲并支持妇女教育”<sup>①</sup>。据迈尔斯的批评者说，他参加了戴笠主持的集体审判，审判后那些政治犯就被活埋了。这位浪漫而可怕的海军军官提前在中国揭开了冷战的序幕，后来他得了夸大妄想症并于1945年9月被送回美国。中国共产党对迈尔斯的活动进行抗议是完全正当的。

迈尔斯一事说明，史迪威在中国的战时努力是怎样被限制在国民党的冷漠和中美反革命行为之间的。乔·史迪威这个带兵高手很想教中国那些被征募来服兵役的农家子弟们怎样保卫自己的祖国。他身上体现了我们引以为荣的美国人的优点，如民主和主动尽职。他的经历说明了一个有天赋又有超人毅力的人能够取得什么，以及不能够取得什么。

毫无疑问，史迪威很幸运没有成为中国抗日军队的统帅——在史

<sup>①</sup> 这段话引自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241页。引用迈尔斯在1945年8月的话。

迪威 1944 年被召回前罗斯福总统曾经这样建议过。那将使他置身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中国的爱国情绪正在高涨，而国共战争已经开始。这个曾被蒋介石拒绝的（由史迪威统率中国军队的）任命将使美国卷入“二战”后的中国，从而招致一个致命的“超级越南”。即便如此，直到 30 年后美国才承认了中国革命。

## 前言

本书的主题是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广义上说是美国跟亚洲的关系。这个主题的载体便是史迪威将军的职业生涯。为什么一定要选取史迪威呢？因为他在工作上专注于中国问题，但其背景和个性又是典型美国式的；因为他与中国的联系所跨越的那段时间影响了今天的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戏剧化的开场，一直到1944年国民政府走向衰败的关键一年；因为他在这两个时间之间的岁月里的工作也折射了当时时代的情况——1920年至1923年的军阀时代他是语言教官，1926年至1929年蒋介石逐渐得势上台时他是美国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军官，1935年至1939年日本入侵时他是美国驻华武官，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中缅印战区司令；还因为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几年里，他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位不耐烦的、尖酸无礼的“酸醋乔”并不是担当这个角色的理想人选。但是，由于他对中国语言和这个国家的了解，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对自己任务的自信和执着，再加上他的官方地位和权力，这使他代表了他的国家在亚洲所做的最大努力，并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也体现了这种努力悲剧的局限性。

我完全意识到了涉足美国对华政策领域的危险性。自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美国所做的巨大努力都付之东流后，美国对华政策这个话题近来在公众生活领域激起了最令人愤慨的和极具破

坏力的诋毁浪潮。不过，因为中国是我们卷入东南亚的根本原因，所以尽管有风险，这个题目还是值得探讨的。还应该加上一句：虽然本书的叙述结束于1946年，但着重于探讨本源，并非简单地局限于昨天。史迪威将军在1945年写给西点军校毕业班的信里说：“你们会听到这样那样的说法，说这一代或者那一代人怎么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并把我們拖入战争。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所有还活着的人和那些死去的人一样，都需要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负责。”

我还想补充说明一下史迪威将军的日记，因为很自然地，这是传记作者的主要材料来源。但我因此冒犯了他，因为这些日记原本只是供他自己阅读的。“这个小日记本，”他在1906年那本便携式日记的扉页上明确警告说，“跟你他妈的毫无关系！”我认为个人有隐私权，因此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后代有“权利”违背某个公共人物的意愿去了解他的私人生活。不过就史迪威而言，历史的需要已经超越了隐私权。在战争之后，让史迪威用自己的声音去说话，去解释在他引起很多争议的指挥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但重要而且必需。经他家人许可，他在1942—1944年间的战时日记和信件经过前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编辑，以《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之名于1948年出版。这些文件的原件以及其他战时文件还提供给了查尔斯·罗曼努斯（Charles Romanus）和莱利·桑德兰（Riley Sunderland），他们都是中缅印战区官方陆军史的撰写者。这些文件后来捐献给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的胡佛图书馆，以供公众使用。既然做出了上面这样的决定，那么向他的传记作者开放其他有关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经历的档案材料也就顺理成章了。史迪威太太给我看了那些她所保存的迄今尚未出版的日记、信件、文件、剪贴本和家庭相册等。这些材料在参考文献中有进一步说明。

《史迪威文件》出版后引起轰动，成了畅销书，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更成了他们引用各种珍贵事实和生动语句的来源。不过听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的日记并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

不能全部代表。这些日记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别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借助日记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放毒”；他这方面原本就有天赋，而当时那种让人沮丧的环境自然又是火上浇油。有时光写日记还不过瘾，之后他还会用大笔记本或者用单张纸把日记改写或者进一步展开，而这些他也都保存下来了。有时候这个过程本身也被记录下来：“写啊写，可怕。”或者是：“我这么涂涂画画，只是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热器。”这些在其他人那里不过是稍纵即逝的烦恼都变成了历史的陈迹。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怨气往往会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这里被以过高的比例保留下来了。

最后一点是，我很清楚，这本书就其主题而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不公平的。由于本书尤其是后半部所关注的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低潮，而且集中关注了军队素质，有不少负面描写。那些使得中国人民列于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质，如和蔼可亲、艺术想象力和哲学思考力、性格坚毅、聪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劳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传达出来。作为作者我只能对此深表遗憾。

## 致谢

很多人对本书都有贡献，在这里我对他们的帮助、建议和批评表示诚挚的谢意。首先要感谢约瑟夫·史迪威夫人（Mrs. Joseph W. Stilwell），她准许我使用并引用所有她保存的有关她丈夫的文件和家书，并在我研究这些材料时给予我热情接待；感谢贝蒂夫人 [Mrs. Bettye, 前本杰明·史迪威夫人（Mrs. Benjamin Stilwell）] 一丝不苟地誊抄日记，并整理好文件；感谢将军的长女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Mrs. Nancy Stilwell Easterbrook）以及她的丈夫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Ernest Easterbrook）将军，在本书写作期间他们一直有很多真知灼见并提供了很多信息；要感谢史迪威将军的妹妹斯图尔特·瓦尔德夫人（Mrs. Stuart Wilder）提供的回忆情况。

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在知识上给予指导，抽时间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意见；感谢史迪威的高级助手、多年来在很多场合中与其共事的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准将，他提供了跟费教授一样的帮助，并接连不断地提供了大量信息；感谢大卫·包瑞德（David D. Barret）上校，1927—1945年他曾在中国服役，大多数时间是与史迪威一起，他给予我的指导十分生动，并真诚地说服我要“淡化个人魅力”；感谢马歇尔将军的传记作者弗里斯特·珀格（Forrest Pogue）博士对我的疑问总是给予

及时回答；感谢前中缅印战区物资供应处主任雷蒙·威勒（Raymond A. Wheeler）中将给予我热情的关注并帮助安排采访和引见。

我还要感谢很多曾经经历了这段历史中的事件的人，他们亲自回答我的问题、给予解释、回忆那段历史并提供了各种其他帮助。其中包括：特莱弗·杜普伊（Trevor Dupuy）上校和塞缪尔·格里菲斯（Samuel B. Griffith）将军，他们不约而同地分别给予这个计划以最初推动力，那时这个计划还只是我头脑中一个隐约的想法；感谢前总参谋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商震、前军械署长俞大维、前交通部长张嘉璈、原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霍拉斯·殷（Horace Eng）；感谢原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八师的四位军官，他们曾参加缅甸战役，给我提供了作为亲历者的看法和信息；我还要对前驻华外交官们表示感谢，其中负责中国事务的有埃德蒙·克拉布（Edmund Clubb）、约翰·塞尔维斯（John Service，中文名谢伟思）、约翰·培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约翰·爱默森（John Emmerson）、菲利普·斯普拉斯（Philip Sprouse）和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感谢他们提供了他们非常了解的事件的情况以及人物情况；此外还要感谢克拉布夫人（Mrs. Clubb）、谢伟思夫人（Mrs. Service），以及文森特夫人（Mrs. Vincent），是她们提供了补充材料；还要感谢罗斯福总统的同事们，这包括艾弗莱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大使、塞缪尔·罗森曼（Samuel Rosenman）法官、本杰明·科恩（Benjamin V. Cohen）以及总统的女儿詹姆斯·哈尔斯台德夫人（Mrs. James Halsted）；感谢缅甸的蒙巴顿伯爵（Earl Mountbatten of Burma），他在百忙之中抽出一个上午并生动地回忆了当时的很多情况；感谢约翰·凯斯威克（John Keswick）和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进一步从英国的角度提出了看法，并且热情地招待了我；感谢曾在中国或者中缅印战区工作过的记者们，这其中包括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白修德，提尔曼·德定（Tillman Durdin）、布鲁克斯·埃金森（Brooks Atkinson）、埃瑞克·塞瓦雷德（Eric Sevareid）；还要感谢下面这些跟史迪威共事过的军官、朋友，或者有其他关系的人：陆军五星上将奥马尔·布莱德



雷 (Omar Bradley), 雅克布·德弗斯 (Jacob Devers) 上将, 马修·里奇维 (Matthew B. Ridgway) 上将, 迈克斯维尔·泰勒 (Maxwell Taylor) 上将, 阿尔伯特·魏德迈 (Albert C. Wedemeyer) 上将, 弗兰克·罗伯茨 (Frank Roberts) 少将, 托马斯·廷伯曼 (Thomas Timberman) 少将, 波特纳 (H. L. Boatner) 少将, 托马斯·阿尔姆斯 (Thomas Arms) 准将, 托马斯·贝茨 (Thomas Betts) 准将, 克里斯特 (W. E. Crist) 准将, 麦克纳里 (E. J. McNally) 准将, 弗里德里克·蒙森 (Frederick Munson) 准将, 亨利·拜罗德 (Henry A. Byroade) 大使, 乔治·德莫特里亚迪 (George Demetriadi) 上校, 小托马斯·阿尔姆斯 (Thomas Arms, Jr.) 上校, 约翰·马格鲁德夫人 (Mrs. John Magruder), 西蒙·玻利瓦尔·巴克纳夫人 (Mrs. Simon Bolivar Buckner), 詹姆斯·麦克休夫人 (Mrs. James McHugh), 保罗·琼斯 (Paul Jones) 夫妇, 迪恩·拉斯克 (Dean Rusk) 夫妇, 约瑟夫·艾尔索普 (Joseph Alsop) 夫妇, 迪伦·雷普利 (Dillon Ripley), 理查德·扬 (Richard M. T. Young), 罗杰·希尔斯曼 (Roger Hilsman), 还有将军的家庭成员埃利斯·考科斯 (Ellis Cox) 上校及其夫人、本杰明·史迪威 (Benjamin Stilwell) 博士以及已故的查尔斯·迪尤尔 (Charles Duell) 先生。

我要特别感谢切斯特·波尔斯 (Chester Bowles) 大使使我可以去阿萨姆邦 (Assam), 感谢瓦特 (J. T. Watt) 夫妇在那里给予我热情招待, 还要感谢福坎 (J. Phookan) 先生的陪护。在台湾所得到的协助要感谢哈里·科里尔 (Harry Collier) 上校和福克斯·巴特菲尔德 (Fox Butterfield) 先生, 在香港所得到的协助则要感谢美国领事馆的阿兰·怀廷 (Alan Whiting) 先生和威廉·维特森 (William Whitson) 上校。

在研究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帮助, 这主要要感谢国家档案馆 (National Archives) 军事部的约翰·泰勒 (John E. Taylor) 先生和斯坦福市胡佛图书馆的肯尼斯·格莱奇尔 (Kenneth Glazier) 博士; 我还要感谢在史迪威研究方面比我做得更早的查尔斯·罗曼努斯先生, 他是三部内容翔实、极具参考价值的中缅印战区史著作的作者之一, 感谢他的热情接待和阐释; 还要感谢他在军事史处主任办公室的那些同事, 包